

走向海洋：宋代江南地区的对外开放

陈国灿 吴锡标

(浙江师范大学 江南文化研究中心,浙江 金华 321004;衢州学院 科研处,浙江 衢州 324000)



第一作者近影

[摘要]入宋以后,随着江南社会的飞跃和统治政策的调整,形成了多层次的对外开放格局。从地域空间结构来看,主导性口岸、辅助性口岸、补充性口岸和前沿腹地、核心腹地、附属腹地相结合,构成了完整的开放体系。从纵横维度来看,开放活动主要集中于经济和文化领域,开放对象并不局限于与宋政府有政治关系的东亚高丽等国,而是扩大到东南亚、南亚、西亚的众多国家和地区。从活动模式来看,民间力量扮演了主导角色。一方面,以海商为代表的民间群体不仅是中外经济交流的主力军,在推动文化开放和政治交往方面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海外来华人员的大幅增加,使中外互动呈现出空前的活跃。对外开放的全面展开和不断深入,既是江南社会日益突破以中原地区为核心的高度统一的农耕文明体系的反映,也标志着中国社会开始从中原主导的内陆型社会转向由江南引领的海陆型社会。

[关键词]宋代 江南 对外开放 口岸 腹地 开放领域 活动模式

[作者简介]陈国灿(1966—),男,浙江省绍兴县人,历史学博士,浙江省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浙江师范大学江南文化研究中心首席专家,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主要从事江南区域史研究。

吴锡标(1965—),男,浙江省诸暨市人,衢州学院科研处教授,主要从事江南区域史研究。

[中图分类号]K2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2011)12-0122-08

围绕两宋时期的中外关系,学术界的讨论大多集中于此期空前活跃的海外贸易和相关体制的演变;^①也有一些学者注意到海外贸易发展对中外关系和沿海地区社会的影响,但主要局限于经济角度的分析。^②其实,宋代海外贸易的兴盛,与其说是推动中外关系变革的动因,不如说是此期中外关系调整的表现之一。从整个中国古代对外关系史来看,宋代之所以是一个引人注目的转折期,一方面

① 学术界有关宋代海外贸易的讨论,较系统的研究成果有陈高华、吴泰《宋元海外贸易史》(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黄纯艳《宋代海外贸易》(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日]桑原鹭藏《唐宋贸易港研究》(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日]藤田丰八《宋代之市舶司与市舶条例》(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等。
② 如葛金芳《两宋东南沿海地区海洋发展路向论略》[载《湖北大学学报》,2003(3)]、熊燕军《宋代东南沿海地区外向型经济成分增长的程度估测及其历史命运》[载《韩山师范学院学报》,2007(1)]等,都是这方面的专题研究之作。

在于中外交流的重心从北方转移到南方,由陆路全面走向海洋;另一方面则是具有开放求实取向的海洋意识的显著增强,冲破了传统“夷夏观”和自大心态的束缚,进而促成多层次对外开放格局的形成。这当中,江南地区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不仅走在对外开放的最前沿,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此期对外开放的基本形态和时代特征。

一、对外开放的社会背景: 历史传统与现实环境

宋代江南地区的对外开放,既是海外交往的历史传统进一步发展的结果,也与时代环境的重大变化密切相关。

早在汉代,江南地区的会稽郡就已与生活于海上的东鯤人发生联系。《汉书·地理志下》载:“会稽海外有东鯤人,分为二十余国,以岁时来献见。”《后汉书·东夷传》也提到,东鯤人“时至会稽市”。六朝以降,伴随着大规模的地域开发和社会发展,江南的对外交往日趋活跃。两晋时期,位于会稽郡东部的鄞县已成为重要的海上贸易口岸,“泛船长驱,一举千里。北接青、徐,东洞广、交,海物惟错,不可称名”。^①至隋唐五代,杭州、明州等港口城市的相继崛起,使江南在中外关系中发挥出越来越大的作用和影响。日本学者三上次男指出:“逐渐增加的对海上贸易的大量需求,在9世纪至10世纪左右迸发了出来。从阿拉伯、印度方面一只又一只大船开进广州、泉州、明州、杭州等地,购得货物后又西行回国,中国方面的巨船也驶向南海大洋。”^②据有关学者考证,从唐开成四年(839年)到后周显德六年(959年),中日之间的商船和人员往来见于史载的有52次,除17次始发港和到达港情况不详外,其他35次中有18次是由明州进出的;^③在后梁开平三年(909年)至后周显德六年(959年)的半个世纪中,渡海前往日本的吴越国民间商团,见于史载的就有26次。^④除了贸易活动,还有文化和政治领域的交流。如台州天台山国清寺是中国佛教最早宗派天台宗的活动中心,由是吸引了众多日本和新罗僧人陆续前来学习,对两国文化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唐末五代,地处江南的吴越政权与朝鲜半岛的新罗、高丽、百济诸国一直保持良好的政治关系。后唐同光三年(925年),吴越主钱鏐“遣使册新罗渤海王,海中诸国皆封其君长”^⑤。天成

二年(927年),高丽与百济发生战争,吴越又应邀派使者进行调解,最终化解了两国的冲突。

不过,相对于有形的对外交往活动,更值得关注的是江南独特的地域文明所孕育的对外意识。与中原社会强烈的华夏正统观和上下有别的等级意识不同,江南在历史上很长一段时期里一直属于“蛮夷”生活的“化外”之地,形成了讲求实用的价值取向和灵活应变的文化性格。反映在对外关系上,所注重的不是四方拜伏的尊荣,而是实际利益的获取;不是居高临下的恩赐和宽容,而是平等、平常的互相交往。正是这种文化意识上的差异,导致了江南和中原在对外关系上的不同形态和特点。入宋以后,江南社会实现全面飞跃,进而确立起在全国的领先地位,原本由中原主导的对外关系也必然随之发生相应的变化。

有关宋代江南社会的飞跃,学术界已有诸多讨论。这里需要指出的是:第一,江南区域经济的全面高涨,尤其是商品生产与流通的空前活跃,不仅为对外开放提供了必不可少的经济条件和物质基础,而且直接引发对外经贸关系的变动,推动外贸活动主体由官方向民间转移。第二,城市形态的转变和区域城镇体系的形成,在带来江南经济和社会一系列变革的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对外开放的“助推器”和活动载体。随着各级城市日益突破原有政治和军事性质所构成的限制,由封闭、保守的统治中心转变为开放的社会综合中心,对外开放的地域空间也由沿海少数孤立口岸向内地扩展。同时,市镇在农村地区的广泛兴起和发展,打破了农耕社会的封闭性和小农经济的自给性,使之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对外开放之中。宋宁宗嘉定十三年(1220年),有臣僚上言:“黄姚税场系二广、福建、温、台、明、越等郡大商海船辐辏之地,南擅澈浦、华亭、青龙、江湾牙客之利,北兼顾泾、双滨、王家桥、南大场、三槎浦、沙泾、沙头、掘浦、萧泾、新塘、薛港、陶港沿海之税,每

① 陆云:《陆士龙文集》卷10《答车茂安书》,见《四部丛刊》本。

② [日]三上次男:《陶瓷之路》,第154页,李锡经等译,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

③ [日]木宫彦泰:《日中文化交流史》,第224页,胡锡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④ 吴振华主编:《杭州古港史》,第70—71页,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1989。

⑤ 吴任臣:《十国春秋》卷78《吴越二·武肃王世家下》,北京,中华书局,1983。

月南货商税动以万计。”^①这里提到的黄姚等十多处市镇分布于太湖流域东部,它们不仅彼此之间形成地域性市场网络,而且与海外贸易发生密切联系。第三,江南社会强烈的求实意识,使之不受中原文明主导下形成的传统观念的束缚,将对外关系从“夷夏有别”的既有模式中解脱出来,走上真正意义上的对外开放道路。南宋前期兴起于浙东地区的事功思潮之所以引起朱熹等主流理学家的激烈反弹和深深忧虑,就在于事功学者求实实用的思想倾向和“不蹈规矩”的开放意识,颠覆了“重义轻利”的传统价值观和“内圣外王”的社会理想,将江南文化中潜在的“异端”趋向上升为一种公开的思想理论。^②

当然,两宋时期以江南地区为代表的对外开放格局的形成,也与赵宋政府统治政策的调整有关。一方面,与汉唐相比,宋朝的社会控制较为宽松,人们有一定的自由活动空间,其中也包括正常的对外交往活动,这显然有利于对外开放广度和深度的拓展。另一方面,宋朝的对外政策有两个特点:一是“守内虚外”,其关注重点始终放在处理与北方辽、夏、金政权的关系和内部所面临的统治危机,对于海外政治交往采取消极被动乃至不作为的态度。综观有宋一代,除了高丽和交趾,宋政府很少向其他海外国家派遣正式使者。这种外交政策固然无法带来汉唐两代那种崇高的国际威望,却为民间的对外交往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也使得中外关系更多地呈现出平等、平常的状况。二是“重利轻义”,不再追求四夷宾服、万国宗主的虚荣,而是注重对外交往的实际利益。与薄来厚往的贡赐贸易不同,民间海外贸易既有助于沿海经济的发展,又能为政府带来可观的市舶收入,故宋政府在收缩对外政治交往的同时,又放开国门,大力鼓励和发展民间海外贸易。绍兴七年(1137年),宋高宗对臣下说:“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合宜,所得动以万计,岂不胜取之于民。”^③这正反映了宋政府在中外关系上的实用主义倾向。

二、对外开放的地域结构: 口岸体系和腹地层次

口岸和腹地是构成对外开放地域形态的基本要素,也是衡量一个时期对外开放程度的重要标准。宋代江南地区对外开放的全面展开和不断深入,首先便表现为沿海口岸体系的形成和腹地空

间的日益扩大。

历史上,江南地区的对外交流口岸在宋代以前就已存在,但数量很少,彼此孤立,而且受到政府的严格控制。入宋以后,江南沿海的对外口岸大幅增加,除了杭州(临安)、明州(庆元)等著名港口城市,又有温州、台州、镇江(润州)、江阴、华亭、青龙、澉浦、章安、上海、江下、黄姚、顾泾、双滨、王家桥、南大场、三槎浦、沙泾、沙头、掘浦、萧泾、新塘、薛港、陶港、江湾等一批中小口岸,由此构成了地域性的口岸体系。这众多口岸有的是政府指定的,更多的属于民间自发形成的。它们规模不一,特色各异,在对外开放中扮演了不同的角色。其中,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层次:

一是主导性口岸,以杭州、明州为代表。杭州在唐五代时就已是东南沿海最重要的贸易港口之一,“东眇巨浸,辘闽粤之舟楫;北倚郭邑,通商旅之宝货”^④。宋初在该城设置两浙市舶司,负责管理江南沿海的对外贸易和交往活动。“商旅出海外蕃国贩易者,须于两浙市舶司陈牒,请官给券以行,违者没入其宝货。”^⑤宋神宗元丰八年(1085年)进一步规定:“诸非杭、明、广州而辄发南海商舶船者,以违制论。”^⑥明州自宋真宗咸平二年(999年)单独设置市舶司后,很快发展成为与日本和朝鲜半岛高丽等国往来的主要口岸。到元丰八年(1080年),宋廷明确规定:“诸非广州市舶司辄发过南蕃纲舶船,非明州市舶司而发过日本、高丽者,以违制论。”^⑦南宋中期,江南地区的不少市舶机构陆续被撤销,但庆元(由明州改称)市舶司一直保留,其口岸职能也获得进一步加强,“凡中国之贾高丽,与日本诸蕃之至中国者,惟庆元得受而遣焉”^⑧。

① 徐松辑:《宋会要辑稿·食货》,18之29,北京,中华书局,1997。

② 南宋事功思潮和理学的尖锐对立,突出体现于宋孝宗统治后期著名事功学者陈亮与理学大家朱熹之间的一场思想大论战。参见陈国灿:《陈亮的反理学思想与“朱陈之辩”》,载《浙江学刊》,2009(6)。

③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绍兴七年闰十月辛酉,北京,中华书局,1988。

④ 罗隐:《杭州罗城记》,见李昉等编:《文苑英华》,卷811,北京,中华书局,1966。

⑤ 《宋会要辑稿·职官》,44之2。

⑥ 苏轼:《东坡奏议》卷8《乞禁商旅过外国状》,见明成化本。

⑦ 《东坡奏议》卷8《乞禁商旅过外国状》。

⑧ 罗澹,方万里:《宝庆四明志》卷6《市舶》,见《宋元方志丛刊》本,北京,中华书局,1990。

二是辅助性口岸,包括温州、江阴、镇江、台州等。温州是江南沿海仅次于杭州和明州的港口城市,南宋初一度成为官方指定的开放口岸,设有专门的市舶机构。宋宁宗庆元元年(1195年)后,温州市舶机构被裁撤,但民间对外贸易和人员往来仍在继续。当地著名诗人徐照有诗云:“两寺今为一,僧多外国人”;“夜来游岳梦,重见日东人”。^①说明当时的温州生活着不少海外人员。位于长江口南岸的江阴与温州相似,其境内有黄田港可通海舶,吸引了不少蕃商。王安石曾赋诗描述说:“黄田港口水如天,万里风樯看贾船。”^②宋高宗绍兴十五年(1145年),江阴正式成为对外贸易口岸,“依温州例置市舶务,以见任官一员兼管”^③。其舶货交易集中于军城澄江门外的江下市,“商船倭舶岁尝辐辏,故市大于城闉”^④。镇江和台州则始终是民间对外交流口岸。建炎三年(1129年)三月,有臣僚上言,称“自来闽、广客船并海南蕃船转海至镇江府,买卖至多”^⑤。宋宁宗时,台州知州包恢在谈到当地铜钱大量外流情况时说,“倭船自离其国渡海而来,或未到庆元之前,预先过温、台之境,摆泊海崖,富豪之民公然与之交易”;“及倭船离四明之后,又或未即归其国博易,尚有余货,又复回旋于温、台之境,低价贱卖,交易如故”。^⑥

三是补充性口岸,多为兴起于沿海地带的市镇。如海盐县澉浦镇邻近杭州,又有优越的港湾条件,宋室南渡后成为都城临安的外港,其居民“不事田产”,“惟招接海南诸货物,贩运浙西诸邦”。^⑦太湖流域东部的华亭县青龙镇“南通漕渠,下达松江,舟楫去来,实为要冲”^⑧,由是“蕃商船舶辐凑住泊”^⑨。政和三年(1113年),宋政府在该镇设置市舶机构进行管理。南宋初,还一度将两浙市舶司移住华亭县城,华亭市舶务移至青龙,委“监税官招邀船舶到岸,即依市舶法就本镇抽解”。^⑩江湾原本是商船溯江而上赴青龙镇的中转地,“商贾舟船多是稍入吴松江,取江湾浦入秀州青龙镇”^⑪。南宋中期,由于吴松江上游水道淤塞日趋严重,江湾逐渐取代了青龙镇的地位。位于吴松江下游的上海镇是南宋中后期华亭县境内兴起的又一个口岸,《正德松江府志·沿革》载:“上海县在府东九十里,本华亭县地,旧曰华亭海。后以人烟浩穰,商舶辐辏,遂成中市。宋即其地立提举市舶司及榷货场,曰上海镇。”

从表面上看,江南的对外开放就地域空间而言主要集中于沿海地带,这一地带不仅分布着众多口岸,而且开放活动由城镇向乡村扩展。《嘉泰会稽志》中提到,每逢正月十五元宵节,浙东会稽县要在城外开元寺前举办大型灯会,都会吸引大批商人前来贸易,其中就有不少海外舶商。“傍十数郡及海外商估皆集,玉帛、珠犀、名香、珍药、组绣、髹藤之器,山积云委,眩耀人目。”^⑫不过,沿海州县只是开放的前沿区域,广大的江南内陆地区才是支撑对外开放的核心腹地。一方面,各口岸的开放活动——无论是规模庞大的货物贸易,还是异常活动的人员往来和文化交流——在依托沿海地区的同时,更主要的是以内陆地区发达的经济和文化为基础的。南宋人周密说,日本居民“所衣皆布”,“得中国绫绢则珍之”。^⑬其中,最为日本人珍爱的“吴郡之绫”,即为太湖流域北部平江府一带所产的丝织品。江南是宋代书籍刻印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位于内陆盆地的婺州等地都是重要的刻印中心,所刻印的书籍大量输往海外。^⑭宋人张端义提到,朝鲜半岛的高丽国收藏有大量汉籍,“其国异书甚富,自先秦以后晋唐隋梁之书皆有之,不知几千家几千集”。^⑮至于各口岸输入的各种海外舶货,也以内地为主要销售市场。前文提到澉浦镇居民将“南海诸货物”“贩运浙西诸邦”,便是这方面的一个例证。另一方面,宋政府也允许部分海外人员和蕃商在有关口岸办理手续后,直接进入内地。《宋稗类钞·俚语》载:“高丽自明州海道入贡,偶乘风自江路至豫章。”这里所说的豫章是指江南西路首府洪州,虽非贸易

① 徐照:《题江心寺》、《移家雁池》,见《芳兰轩集》(不分卷),汲古阁景宋钞本。

② 张袞:《嘉靖江阴县志》卷2《市镇》,见《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本。

③④⑩ 《宋会要辑稿·职官》,44之25、44之1、44之13。

④ 《嘉靖江阴县志》卷2《市镇》。

⑤⑪ 《宋会要辑稿·食货》,50之11、17之36。

⑥ 包恢:《敝帚稿略》卷1《禁铜钱申省状》,见《民国宋人集》本。

⑦ 常棠:《澉水志》卷上《地理门》,见《宋元方志丛刊》本。

⑧ 杨潜:《云间志》卷下,见《宋元方志丛刊》本。

⑨ 施宿:《嘉泰会稽志》卷7《寺院》,见《宋元方志丛刊》本。

⑬ 周密:《癸辛杂识》续集卷下《倭人居处》,见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⑭ 有关宋代江南书籍刻印和出版情况,参见陈国灿、陶立方:《略论南宋两浙地区的出版业》,载《宁波师范学院学报》,1996(5)。

⑮ 张端义:《贵耳集》,卷上,见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口岸,仍有一些高丽商人前往贸易。进一步来看,随着江南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入,其活动空间超越了自身的地域范围,逐渐向长江中上游扩展,进而形成更为广阔的附属腹地。这种扩展是以水运大动脉长江为纽带,通过东西部之间日益密切的经济文化联系实现的。史称:“自蜀通吴,商机之往来,货泉之流行,沿溯而上下者又不知几。”^①在川蜀首府成都出现了不少专门经营海外舶货的商人,时人范镇《东斋记事》卷四提到的郑龙脑便是专营龙脑等香药的成都大商人,张世南《游宦纪闻》卷二还具体介绍了蜀人使用香药的办法,说明位于长江上游的川蜀地区与海外的经贸联系在不断加强,其对外联系的主要途径一是通过广南地区,另一个是经由江南各口岸。

三、对外开放的纵横维度: 活动领域和交流范围

中国古代的对外交往,就其活动内容而言,不外乎政治、经济、文化三个领域。不过,汉唐时期的对外交往是以政治关系为前提和基础的,中原政权以“天下正统”的心态来看待和处理与海外各国的关系,将各种交流活动视为对夷邦蕃国的一种“恩赐”。宋王朝“守内虚外”和讲求实利的对外政策,改变了中外关系的传统格局。虽然政治领域的对外交往大幅萎缩,但经济和文化交流不仅没有受到严格限制,反而呈现出空前活跃的态势。反映在江南地区,一方面,对外开放主要集中于经济和文化领域,其开放的广度和深度超越了以往任何一个时期;另一方面,开放对象并不局限于与宋政府有政治关系的东亚高丽等国,而是扩大到东南亚、南亚、西亚的众多国家和地区。

海外贸易的迅猛发展是宋代对外经济交往日趋密切的一个突出表现。有学者估计,整个东南沿海地区,“北宋中期每年的进出口总额为 1666.6 万缗,北宋后期每年进出口总额为 2333.4 万缗,南宋绍兴晚期每年的进出口总额为 3777.8 万缗”^②。贸易规模的不断扩大,固然与宋廷采取积极鼓励的政策有关,但更主要的是经济领域变革和走向开放的结果。从江南地区来看,城乡经济的高涨和商品化水平的提高,意味着输往海外的商品越来越多,对海外商品的市场需求也越来越大,由此推动贸易领域的全面拓展和贸易品种的大幅增加。在出口方

面,除了丝绸、瓷器等传统手工业产品,还包括金银饰品、铜铁器具、钱币之类的金属制品,漆器、草席之类的日用品,纸、墨、笔之类文化用品,玩具、伞、扇之类的工艺品,粮食、盐、茶叶、酒之类的食用和饮用品等。宋宁宗嘉定十年(1217年)三月,有臣僚谈到江南沿海粮食走私情况时说:“沿海州县,如华亭、海盐、青龙、顾泾与江阴、镇江、通、泰等处,奸民豪户广收米斛,贩入诸蕃,每一海舟所容不下一二千斛,或南或北,利获数倍。”^③粮食输出是宋政府一再严令禁止的,但在高额利润的驱动下,商贩们仍私下大量贩运海外。在进口方面,由原来主要局限于香料、珍珠、象牙等高档消费品,扩大到药材、矿产、手工制品、加工食品等诸多普通物品。修撰于南宋中期的《宝庆四明志》详细记录了当时经由庆元港输入的细色(高档)和粗色(普通)货物品种,其中来自高丽分别有 6 种和 34 种,来自日本的分别有 7 种和 6 种,来自占城等东南亚地区的分别有 17 种和 61 种,来自其他海外地区的分别有 48 种和 22 种。正是随着越来越多的生产和消费活动与海外市场发生联系,江南经济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朝外向型方向发展的趋势。特别是在沿海州县,对外贸易成为社会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决定着部分城镇的兴衰。南宋前期,江阴由常州所属的一个小县城发展为相当繁华的都市,就是基于活跃的海外贸易。《民国江阴续志》卷二一引建炎二年(1128年)《复江阴军牒》云:“本县为临江海,商旅般贩浩大,所收税钱过迭常州之数。”南宋后期,一度被称为“富商巨贾,豪宗右族之所”^④的华亭县青龙镇,由于江河淤塞,海舶渐稀,最终走向衰落。

与经济领域一样,江南地区文化领域的对外开放也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主要表现为:一是人员往来频繁。据不完全统计,有宋一代,仅有名可考的来华日本僧人就有 181 人,实际人数显然较此要多得多。^⑤江南作为宋代佛教最为发达的区

① 《嘉庆四川通志》卷 50 引(宋)《江津县心舟亭碑刻》,《中国地方志集成》本。

② 熊燕军:《宋代东南沿海地区外向型经济成分增长的程度估测及其历史命运》,载《韩山师范学院学报》,2007(1)。

③ 《宋会要辑稿·食货》,38 之 43。

④ 陈林:《隆平寺经藏记》,见徐硕:《至元嘉禾志》卷 19,收入《宋元方志丛刊》本。

⑤ 王勇、郭方平等:《南宋临安对外交流》,第 126—127 页,杭州出版社,2008。

域之一,自然是这些来华僧人的主要活动地。与此同时,也有不少江南僧人赴外弘法。如南宋时赴日的高僧中,就有寄寓庆元府天童山的兰溪道隆(普觉禅师)、杭州径山寺石溪心月的法嗣大休正念(佛源禅师)、天童寺石矶惟衍法嗣西涧士昙、天童山景德禅寺首座无学祖元等人。二是交流领域的拓展。除了宗教外,教育、哲学、文学、音乐、舞蹈、书画、科技等方面的交流也十分活跃。如日僧心地觉心曾在杭州护国仁王禅寺学习吹奏尺八,回国后大力普及,成为尺八这一中国传统乐器在日本普及的祖师;另一位日僧弥三在庆元等地求法时掌握了造缎技术,回国后在博多等地传播,推动了日本纺织技术的发展。三是市场因素的介入。宋代商贸风气盛行,波及到对外文化交流,最典型的是书籍输出。特别是长期接受中国文化影响的高丽、日本、交趾等国,对宋朝文化有着特殊的爱好。由于宋廷对官方书籍交流有较为严格的限制,宋哲宗时还一度规定以“文字禁物与外国使人交易,罪轻者徙二年”^①,故高丽等国往往通过商人收购中国书籍,且规模庞大。如宋商徐戩接受高丽的大宗图书订单,“雕造经板二千九百余片”,“受酬答银三千两”。^②江南地区的书籍刻印业十分发达,且印书质量上乘,尤其是杭州,更是全国闻名的刻印中心。时人叶梦得说:“天下印书,以杭州为上,蜀本次之。”^③因此,书籍成为重要的出口商品。据朝鲜文献《高丽史》卷五记载,高丽显宗十八年(宋仁宗天圣五年,1027),宋江南商人李文忠等献书 597 卷。名为“献书”,实际是以书易货的贸易行为。

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入,伴随着交流范围的日益扩大。除了高丽、日本等东亚国家,江南与东南亚、南亚、西亚乃至东非诸国的交往也越来越密切。史称:“东若高丽、渤海,虽阻隔辽壤,而航海远来,不惮跋涉。西若天竺、于阗、回鹘、大食、高昌、龟兹、拂林等国,虽辽、夏之间,筐篚亦至,屡勤馆人……交趾、占城、真腊、蒲耳、大理滨海诸蕃,自刘鋹、陈洪进来归,接踵修贡”^④;“海南诸国……西至大食尚远,华人诣大食,至三佛齐修船,转易货物,远费辐凑,故号最盛”^⑤。根据有关学者的统计,宋代与中国有贸易往来的国家和地区,在今东亚和东南亚范围的有 37 个,在今印度及孟加拉湾沿岸的有 26 个,在今红海周围及东非沿海

的有 15 个。^⑥这当中,有相当部分国家和地区与江南发生直接或间接的联系。《宝庆四明志》在谈到庆元港进口货物的情况时,特意将“海南占城等”和“其他化外地区”分别单列介绍,显示江南与这些地区已形成较为稳定的贸易关系。与此同时,人员往来和文化交流也相当活跃。如阿拉伯名医卜哈提亚尔携两位弟子来华,在临安等地为百姓治病,三人归真后均葬于临安。庆元城里曾建有清真寺和波斯馆,说明该城有不少阿拉伯人。

四、对外开放的活动模式： 民间主导和中外互动

如前所述,由于宋政府采取实用主义的对外政策,不再一味追求万国宗主的地位,而是注重经济和文化交流所带来的实利,使对外关系的重心由官方向民间转移。江南地区原本就有着深厚的开放意识,随着政治控制的松弛和区域社会的繁荣,以海商为代表的民间交往群体空前活跃,成为对外开放的主导力量。

从历史上看,海商群体的兴起并非始于宋代。早在唐代中后期,随着原为国家控制的海外贸易逐渐转入私人手中,海商势力获得很大发展,开始成为中外交往的重要承担者。据不完全统计,从唐武宗会昌二年(842 年)到唐昭宗天复三年(903 年),海商赴日本贸易的次数仅见于史载的就有 36 次,而整个唐代中日双方政府遣使往来也不过 23 次。^⑦入宋以后,由于政府的积极鼓励,加上海外贸易利润丰厚,“每十贯之数可以易番货百贯之物,百贯之数可以易番货千贯之物”^⑧,出海逐利更是蔚然成风。在江南地区,不同阶层的人们纷纷加入海外贸易的行列。其中,有的是豪商富室,如温州巨商张愿,“世为海贾,往来数十年,未尝失时”;建康巨商杨二郎,“数贩

①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元祐二年八月辛亥,北京,中华书局,1990。

② 苏轼:《东坡奏议》卷 8《乞禁商旅过外国状》。

③ 叶梦得:《石林燕语》,卷 8,北京,中华书局,1984。

④ 《宋史》卷 485《夏国上》,北京,中华书局,1985。

⑤ 朱彧:《萍州可谈》,卷 2,见《丛书集成初编》本。

⑥ 黄纯艳:《宋代海外贸易》,第 31—33 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⑦ 武安隆:《遣唐使》,第 172—175 页,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5。

⑧ 包恢:《敝帚稿略》卷 1《禁铜钱申省状》。

南海,往来十有余年,累货千万”;临安人王彦太,“家甚富,有华室,颐指如意。忽议航南海,营舶货”。^①有的是官僚贵族,如南宋大将张俊遣手下老卒出海贸易,“逾岁而归,珠犀香药之外且得骏马,获利几十倍”^②;宋理宗时,庆元府鄞县人郑清之为相,其子“盗用朝廷钱帛以易货外国”^③。有的是沿海农户和渔民,如台州仙居人郑四客原是个佃户,“后稍有储羨,或出外贩贸纱帛、海货”^④。还有不少僧道人员,如杭州僧人净源,“归居海滨,与舶客交通牟利”^⑤;温州瑞安道人王居常,“泛海往山东”^⑥。可以说,海商成员几乎涵括了江南社会的各个阶层,他们彼此协作,成群结队地开展贸易活动。据朝鲜文献《高丽史》记载,从高丽显宗三年(宋真宗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到高丽忠烈王四年(宋帝赵昺祥兴元年,1278年),先后赴高丽贸易的宋商有130批次,其中确知人数的87批次,合计达4955人。^⑦这当中,有相当部分宋商便来自江南。如高丽显宗九年(宋真宗天禧二年,1018年)四月,有江南人王肃子等24人;高丽显宗二十二年(宋仁宗天圣九年,1031年)六月,有台州人陈惟志等64人;高丽靖宗四年(宋仁宗宝元元年,1038年)八月,有明州人陈亮、台州人陈维绩等147人;高丽文宗三年(宋仁宗皇祐元年,1049年)八月,有台州人徐赞等71人。另据有关学者考证,北宋时期,赴日本的宋商船队可以判明的有70多次。^⑧他们大多从两浙沿海港口出发,抵达日本的肥前、博多、越前等地。

不断壮大的海商群体不仅是中外经济交流的主力军,在推动文化开放和政治交往方面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如宋商郑仁德、孙忠先后将《大藏经》、《法华经》等佛学经书带到日本,前文提到的海商徐戩“先受高丽钱物,于杭州雕造夹注《华严经》,费用浩汗,印板既成,公然于海舶载去交纳”^⑨。宋宁宗时,日僧道元搭宋朝商船来华学习制瓷技术,回国后炼制了著名的“濂户烧”。由于宋政府很少向海外派遣使者,海商便承担起沟通中外政治交往的部分职能。如宋神宗时欲与高丽联系,“福建、两浙有旧贩高丽海商知朝廷遣使,争谋以轻舟驰报”^⑩;南宋时,浙东庆元府与高丽往来的官方牒文,“皆贾舶通之”^⑪。诚如当时日本一位日本大臣所说:“商客至通书,谁谓宋远?”^⑫海商的兴盛还引发了华人侨居外国的热潮。特别是在东亚的日本、高丽和东南亚各国,开始出现有一定规模的华侨群

体。如高丽王城“有华人数百”,大多是“因贾舶至者”;^⑬日本博多的“宋人百堂”是11世纪末逐渐形成的华侨居留区,汇聚了不少来自江南等地的商人和手艺人。南宋时,临安人谢国明长期从事宋朝与日本、高丽之间的贸易活动,后来便定居博多,并加入日本籍,成为当地商界的领袖人物。在他的资助下,日本临济宗僧人圆尔辨圆入宋求法,回国后创立承天寺。至今该寺仍藏有谢国明像,当地民众每年都要定期举办纪念活动。

在江南地区的对外开放活动中,还有一种民间力量颇值得关注,那就是人数众多的海外人员。宋政府在开放本国民众对外交往的同时,对外商和蕃人来华也采取欢迎和优待的政策,如允许他们自由往来和侨居,“听其往还,许其居止”^⑭;保护他们的合法权益,规定“有亏蕃商者,皆重审其罪”^⑮;外商来华和离境时,由官府拨专款迎接和送别,“每年发舶月分,支破官钱,管设津遣”^⑯。在这种政策鼓励下,来华的海外人员大幅增加。他们或经商,或留学,或传教,或游历,有的短暂停留,有的长期定居,不再回国。南宋学者周密说:“今回回皆以中原为家,江南尤多,宜乎不复回首故国也。”^⑰这里所说的“回回”,是指来自阿拉伯地区的回回人。临安清波门外的聚景园原本是皇家苑囿,规模宏大,“孝宗皇帝致养北宫,拓圃西湖之东,又斥浮图之庐九以附益之”^⑱。到南宋末年,该园“岁久芜圯”,成为回回人的公共墓地,可见当时侨居临安的阿拉伯人已有

① 洪迈:《夷坚志》支丁卷3《海山异竹》,《志补》卷21《鬼国母》,支乙卷1《王彦太家》,北京,中华书局,1981。

② 罗大经:《鹤林玉露》卷2《老卒回易》,见明刻本。

③ 《宋史》卷407《杜范传》。

④ 《夷坚志》支景卷1《郑四客》。

⑤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元祐四年十一月甲午。

⑥ 《夷坚志》甲志卷7《搜山大王》。

⑦ 参见杨渭生:《宋丽关系史研究》,第269—279页,杭州大学出版社,1997。

⑧ 王勇、郭平等:《南宋临安对外交流》,第108页。

⑨ 《东坡奏议》卷8《乞禁商旅过外国状》。

⑩ 《续资治通鉴长编》,元丰元年五月甲申。

⑪ 《宝庆四明志》卷6《市舶》。

⑫ 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卷43《日本僧》,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⑬ 《宋史》卷487《高丽》。

⑭⑮⑯ 《宋会要辑稿·职官》,44之9、44之12、44之14。

⑰ 周密:《癸辛杂识》续集卷上《回回沙碛》。

⑱ 潜说友:《咸淳临安志》卷13《聚景园》,见《宋元方志丛刊》本。

相当规模。这些海外人员在接受中国文化影响的同时,也带来各国丰富多彩的文化,对江南社会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如波斯摩尼教传入江南后,吸引了众多信徒,进而成为民间反抗官府的组织工具。史载北宋末年,“温、台村民多学妖法,号吃菜事魔,蛊惑众听,劫持州县”^①。所谓“吃菜事魔”,即指摩尼教。虽然宋廷一再下诏严禁该教传播,但收效甚微。南宋初,起居舍人王居正上言:“伏见两浙州县,有吃菜事魔之俗。……法禁甚严,而事魔之俗愈不可胜禁。”^②

毫无疑问,宋代江南地区的对外开放已不再停留于一般意义上的中外交流,而是涉及区域社会发展道路的相应调整,即由封闭性的农耕社会转向开放性的商品社会。尽管这种转变在有宋一代远没有完成,但它标志着江南地区逐渐突破以中原地区为核心的高度统一的农耕文明体系,开始了由“中国之江南”到“世界之江南”的历史进程。从更广阔的历史视野来看,入宋以后江南社会的繁荣,所带来的不仅仅是全国经济、文化发展地域格局的重大变化,更重要的是,随着文明重心南移过程的基本完成,开放的海洋意识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空间,

中国社会也开始从中原主导的内陆型社会转向由江南引领的海陆型社会。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我国古代经济重心在 11 世纪后半叶完成其南移过程,此点意义十分重大。因为这从根本上改变了战国秦汉以来我国经济一直以黄河流域为重心的经济格局;同时经济重心区域由于向东南方向移动,而更加靠近拥有优良海港的沿海地区,为封闭型的自然经济向开放型的商品经济过渡提供了某种历史机遇。”^③“海外贸易的繁荣渐渐改变了中国人对外部世界的看法,原先偏远无名的东部和南部沿海地区渐渐成为中外贸易和文化交流的重要地区”,“这样,中国人的内陆民族性格就渐渐获得某些海洋民族的特征”^④

(责任编辑:常山客)

① 《宋会要辑稿·刑法》,2 之 111。

②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绍兴四年五月癸丑。

③ 葛金芳:《中国经济通史》,第 5 卷,第 838—839 页,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3。

④ 费正清:《中国:传统与变迁》,第 153—154 页,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

Towards the Ocean: The Opening up of the South of the Yangtze River in Song Dynasty

Chen Guocan & Wu Xibiao

Abstract: Follow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Song Dynasty, a multi-faceted opening up to the outside world took shape as a result of the advancement of the South of the Yangtze River and the adjustment of the ruling policy. In terms of space, the major, ancillary and complementary ports combined with the front, key and adjunct hinterlands formed a complete system of opening up to the outside world. In terms of activities and targets, the opening up focused on economic and cultural activities, targeting not only East Asian countries like Korea that were politically engaged with the Song government, but also countries and regions in Southeast Asia, South Asia and West Asia. In terms of the modes of activities, non-governmental participants played a major role. On the one hand, non-governmental bodies represented by seafaring merchants were pivotal in Sino-foreign economic exchange and instrumental in promoting cultural openness and political exchange; On the other hand, the significant increase in the number of overseas people coming to China contributed to unparalleled activeness of Sino-foreign interaction. The opening up fully unfolded and increasingly deepened, reflecting that the the South of the Yangtze River was gradually breaking through the highly homogeneous rural civilization system in central China and signified that China was beginning to transform itself from an inland society represented by central China to a sea-and-land society heralded by the South of the Yangtze River.

Key words: Song Dynasty, the South of the Yangtze River, opening up, ports, hinterlands, areas of opening up, modes of activities